

经济问题和综合统计 参考资料选编

上 集

山西财经学院计统系统计教研室编

说 明

本资料是我室为满足教学、科研和业务学习的需要，根据国家统计局一九八〇年举办的第一期省、市局长研究班有关学习材料选编的。主要内容有经济理论问题、国内外经济改革、综合平衡统计、概率论基本原理及应用等，分上、下两集。可作为统计教学、经济理论工作人员和广大统计干部学习参考。

由于选编时间仓促，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山西财经学院计统系统计教研室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目 录

谈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苏 星 (1)
当前经济情况和经济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房维中 (9)
关于改善我国经济结构的意见·····	马 洪 (18)
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几个问题·····	桂世镛 (29)
开展生产资料市场调节的一次探索 ——四川省机械局一九八〇年机电产品订货会议总结·····	(46)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	柳随年 (51)
关于经济核算和经济改革的探讨·····	许 毅 (59)
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概论·····	周绍成 (85)
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	周绍成 (97)
关于整顿企业的几点意见·····	康心浩 (109)
厂内经济核算制·····	王庆成 (124)
企业经济核算制·····	王庆成 (134)
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	郑肇樵 (146)
全面质量管理与企业管理·····	刘源张 (154)
关于生产力布局问题·····	薛葆鼎 (162)
关于北京内燃机总厂的调查·····	(173)
苏联经济的组织与管理——无止境地寻找灵丹妙药·····	(179)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	徐向新 (194)
匈牙利新的经济调节制度内容简介·····	(208)
关于匈牙利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情况·····	(211)

谈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苏 星

一、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还处于认识和探索过程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作为一门科学，现在还不成熟，好象一个大厦，正处于设计、筹建当中。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有许多天才的预见。

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只能根据资本主义崩溃以后社会将朝着那个方向发展，预见到某些趋势。列宁说过：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

究竟有什么根据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的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那个方向演变的”。①

马克思没有给自己提出阐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任务。但是，由于他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指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就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在列宁以后，斯大林有许多论述，其中集中论述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是他晚年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著作，是苏联三十多年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研究的总结，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今天，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它的，都不能绕过斯大林书中的论点。

在斯大林的书出版以前，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发展，曾走过一条崎岖的道路。

开始碰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不要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有

①《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43页。

没有经济规律作为人们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罗莎·卢森堡、布哈林等都持否定态度。苏联的许多经济学家也持否定态度。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十月列宁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发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苏联才作为一门科学，开始受到重视。

接着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否具有客观性质？这个问题在苏联经过更长的时间才得到解决。从他们的资料看，一种，是把政治当作经济规律，一九三三年，还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基本经济规律；一种，是说人们可以制造规律；还有一种，是说人们能够改造规律，例如改造价值规律的说法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二年。这些观点，都是否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的。

因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节就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斯大林说：

“某些同志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质，特别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规律的客观性质。他们否认政治经济学规律反映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过程的规律性。他们认为，由于历史赋予了苏维埃国家以特殊作用，苏维埃国家、它的领导人能废除现有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能‘制定’新的规律，‘创造’新的规律。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把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科学规律，它反映自然界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颁布的法律，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无论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①

斯大林还批评了“改造”价值规律的说法，认为“‘改造’规律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规律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①这些，无疑地都是正确的。有些同志不同意斯大林说的限制经济规律作用范围的说法。如果把它理解为限制规律那当然是不正确的。规律是不能限制的，正象不能改造一样。斯大林举的治水的例子，其实是限制了水的泛滥，并没有限制水的运动规律，相反地，只有遵循水的运动规律，才能把水害变为水利。不过，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同经济学家们谈话时有所解释。他说：“不是我们限制规律，而是存在有客观条件，当规律的作用范围受到限制的时候，规律便显示出另外的样子”。这样解释，是正确的。

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最初是学苏联的。我国经济学界，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否定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观点。但是，否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客观性质的观点，却曾经泛滥过。陈伯达、“四人帮”取消商品生产，否定按劳分配，实际上就是废除和消灭经济规律。至于把政策当作规律的说法，五十年代在学术界就已经都有了。

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经济规律，都有那些规律？说法很不一致。这也表明我们对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39页①第544页。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还不成熟。我认为，没有必要花很大力气去争论社会主义社会有多少经济规律，和经济规律如何表述，重要的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当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这就要象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详细占有资料，弄清经济范畴，通过经济范畴的阶梯，一步一步地升堂入室，达到规律性的认识。但是，这不是很快就能办到的。现在，我们只能根据已经达到的认识水平，举出一些大家公认的经济规律来。例如，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价值规律，等等。我们作经济工作，应该认识它们，研究它们，使自己的行动符合它们的要求。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具有过渡的性质。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要注意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区别和联系。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有许多共同点，例如，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是商品经济，都存在价值规律。因为有这些共同点，社会主义经济才有可能从资本主义经济那里得到借鉴，学习它的某些先进经验。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毕竟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制度，它们的规律性是截然不同的。例如，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就做不到。王洪文说资本主义也是按劳分配，是美化资本主义。观察资本主义制度，抛开资本家和工人的鸿沟，只看白领、蓝领，就看不见它的本质。我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和“四人帮”某些混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谬论，要加以分析，进行有说服力的批判。

第二，要注意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共产主义经济规律的联系和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经济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有一些规律是共同的，如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但有些是不同的，如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还有价值规律，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的。即使是共有的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的形式也和共产主义社会不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原则已经有了，但现在我们还不能预见共产主义社会的全貌，现在讲的共产主义，是不是就是将来的共产主义，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比如共产主义是不是都要组成为大公社？就需要研究。这种公社，空想社会主义者设想过。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办过，没办好，但斯大林没有否定它，说当时条件不成熟，将来还要办的。我们一九五八年开始办公社的时候，刮“共产风”，就有这些影响；我们自己的根源则是供给制。供给制在革命战争年代确实起过伟大的作用，但是，这是一种大体平均，略有差别的原则，并不是共产主义。把供给制当作共产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萌芽，实际上是把平均主义当作了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小农经济的幻想。这种思潮，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出现过，一九五八年在我国又重复出现了。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是高度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它的分配、交换、消费都必然适合这样的水平，决不会采取我们在物质贫乏时采取的分配公式。究竟如何？这要靠将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人们去解决了。在社会主义阶段，按经济规律办事，必须重视坚持实行按劳分配，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不是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不重要。不，它们还是主导的规律。但是，它们在社会主义阶段，也不能不受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的制约。发展生

产，满足需要，要通过按劳分配才能实现。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充分利用商品经济有关的范畴作为杠杆。这都是和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的地方，忽视这种不同，就会犯错误。

二、怎样理解按经济规律办事？

研究经济规律，是经济科学的任务。研究它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经济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发现航标，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具有预见性，减少盲目性。用一句简明的话来表述，就是为了按经济规律办事。

按经济规律办事，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要认识和懂得经济规律。根本不懂，怎样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懂，就得学一点经济学。

最近大家很注意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按照斯大林的定义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要理解它，就需要弄懂一些问题。第一，要弄懂发展生产满足需要同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需要和消费并不是一个东西。一切社会都存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人们不能停止消费，就不能停止生产，生产决定消费。反过来，没有消费，也没有再生产，生产又依存于消费。这是生产和消费的一般规律。但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各存其特殊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生产和消费被隔开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向和消费基础相对缩小的矛盾，这种矛盾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才能强制地统一。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这样，就使生产和消费直接联系起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消费水平会不断提高，不会出现资本主义那种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反过来，人民的消费水平提高，又会向生产提出新的需要。马克思说：“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又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①生产和需要的这种矛盾，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因此，不能笼统地说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还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说法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

第二，要弄清什么是需要？需要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不能任意解释的。有人说，生产生产资料也是满足需要，是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应该包括生产的需要和生活的需要。这是不对的。满足生产的需要，并不是生产的目的，生产不能为生产而生产，它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还有人把需要解释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全面的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国防的需要；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等等。也是不对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总要有部分财政开支用于行政国防费用和援外费用，但不能以此作为生产目的。能够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还是斯大林说的那句话：满足人及其需要。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社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4页。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在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以及积累基金中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比例的时候，就要充分考虑人们的需要，不能片面强调积累，忽视消费，片面强调生产性投资，忽视非生产性投资。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建国以来国民经济有两次大调整，每次调整，都是以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为中心。这就证明，发展生产，没有能够充分考虑改善人民生活，或者说，没有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因此，受到惩罚。

其次，要研究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样的规律性，条件不同，出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一般和特殊的差别。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样。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不但要研究一般经济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中国实现的形式。比如，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个普遍规律。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农业有剩余产品（即多余的农副产品）供应工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事业才能发展。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以剥夺农民，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为前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通过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这两者是不同的。这就是特殊性。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不同，这个规律实现的形式也不同。有的国家农业基础比较好，农业对工业的制约性小一些。比如罗马尼亚，农业的自然条件好，每人平均占有七亩耕地，土质较好，雨量充足（六百至七百毫米）；农林牧结合得比较好（森林复盖率百分之二十六点六、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五）；集体经济制度比较稳定，农业基础就好一些，因此，对工业发展的制约就小些。解放以来，罗马尼亚已经有三百万农业人口转到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农业人口的比重从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七十六点四降到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加上人口自然增殖，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在这个期间增加五百万人左右。这样多的人进城，没有发生城市供应紧张和削弱农业生产战线问题，就是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我国的情况就不同，人口多，底子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每人每年平均生产两千多斤粮食），农业对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的制约作用就比较大。我们的经验是：农业丰收，第二年工业的情况就好些；农业欠收，第二年工业的情况就差些。建国以来，我们有过两次职工大增大减的教训。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职工人数大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大减；第二次是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二年职工人数大增，一九七三年又大减。为什么当时城市非减不可呢？主要是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大提高（有几年还降低了）的情况下，职工人数增加超过了当时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数量；农业生产第一线劳动力减少过多，影响了农业生产。所以，当时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比较大的提高，即使再多增加一些职工，也不会发生减人一类的事情。世界上有些国家农业品不能自给，靠进口解决，就是说以国外的农业为基础。但这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进口数量，不能超过国际市场农产品供应的能力，一个是出口贸易发达，有足够的外汇。我国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一是人口多，国际市场供应不起；一是出口贸易不发达，没有那么多外汇。因此，我们发展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只能以国内的

农业为基础，其他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为此，就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农业产量就得靠增加农业劳动者人数。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五七年粮食产量增长两千多亿斤，农业劳动力增加一亿。按照这个标准，再增加两千亿斤粮食，就得再增加一亿农业劳动力。这样，几亿人口搞饭吃的局面就无法改变，农业多种经营、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也就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最后，经济规律看不见、也摸不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它一般是通过党的政策或国家的计划体现出来。因此，制定符合经济规律的政策和计划就非常重要。比如，按劳分配是经济规律，谁看见过按劳分配规律？没有。看见的是国营工厂里的工资和奖金制度，人民公社里的工分制度。我们要按照按劳分配规律办事，就得正确地规定工资和奖金制度，正确地规定工分制度。

怎么知道我们制定的政策或计划符合还是不符合经济规律呢？只能靠实践来检验。我们可以举计件工资为例。我国工业中实行计件工资的工人占生产工人的比重，一九五二年是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到一九五六年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建筑业达到百分之七十六点八，这是最高的一年。根据调查资料，实行计件工资后，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工人的工资收入平均增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一九五六年推广计件工资急了一些，出了一些毛病，经过调整，一九五七年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六点五。这种调整是正常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来，工人热情很高，由于延长工时，旧的定额不断被突破，拿计件工资的工人收入剧增，扩大了计件工人和计时工人的矛盾。有些企业把计件工资取消了。这本来也是一种正常的调整。但是，当时正是提倡共产主义的时候，报刊上宣传，取消计件工资是“共产主义放光芒”，继而又提出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谁搞计件工资，谁就是钞票挂帅。这样，就造成一种政治压力，工厂企业纷纷取消计件工资。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计件工资绝大部分取消了，北京市只剩下百分之二点八。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暴露了取消计件工资的后果：劳动生产率下降，一部分工人收入减少。当时在上海开计件工资的讨论会，许多同志提出，全盘否定计件工资是不对的，应当恢复计件工资。实际上也恢复了一些。下半年一反右倾，恢复计件工资也当作右倾被批判了，谁还敢恢复？一直到一九六一年，有了工业七十条，计件工资才开始恢复。还没有真正恢复起来，一九六四年工厂四清，又冲计件工资。到文化大革命，计件工资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基本上一扫而光。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重新恢复。规律是现象中稳定的东西。从二十多年来的几次反复中我们看到计件工资几次被冲，但冲不掉；冲掉了又恢复。这就证明，它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实际上，按照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计件工资不是搞多了，而是太少，比重还应当大一些，不一定非为辅不可。这种工资形式比较能够体现按劳分配。工资等级，主要是按劳动能力制定的。比如说按劳动能力定为五级，他提供的劳动量不一定达到五级。计件工资就没有这个缺点，它可以使劳动报酬和劳动量一致起来。我最近了解一个建筑队，他们在实行计件工资以后，效率大为提高，定额规定一人一天砌五百块砖，实际上平均砌八百块，而且保证达到质量标准。说明这种工资制度，是能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当然，有些部门不适于实行计件工资，如电力、水泥、化工等部门，

过去也没有实行。将来，自动化水平提高了，现在实行计件工资的部门也可能变成不适于实行的部门。不过那是将来的事情。

按经济规律办事，我提出以上三个方面，它们是密切联系的。把它们贯穿在一起的，是实践。

三、怎样算是违背了经济规律？

一九五二年二月，斯大林同苏联经济学家谈话时，曾就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讲过这样一段话：当这一规律没有被破坏的时候，它平安无事地坐着，它的地址谁也不知道，它是无所不在又是无所在的。一般说来，所有规律都是在被破坏时才令人感觉到，而破坏规律不能不遭殃。有的同志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认为规律不只是在被破坏时才令人感觉到，在被人们认识和利用时，也可以感觉到。后一种说法也有道理，但一般来说，当人们由于破坏规律而受到惩罚时，感觉会更加深刻。

规律是客观的，人们的认识是主观的，主观反映客观只能是近似的，人们的行动不可能完全反映客观规律。在哲学上这叫相对真理。

我们的政策和计划反映经济规律又有其特殊性，它不是反映某一经济规律，往往是反映多方面的经济规律，而且还要反映政治任务的要求。这就增加了观察问题的复杂性。

怎样才算是违背经济规律？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由于价格价值不一致，我们的价格政策违背了价值规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从价格发展的历史来看，商品按照价值或者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仅仅适用于商品生产发展较低的阶段。货币出现以后，价值转化为价格，价格已经不可能完全符合价值了，它只能围绕着价值上下摆动，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平均价格才同价值趋于一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有机构成不同的部门之间的竞争，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格同价值的距离便扩大了，而且相对固定起来。垄断价格的出现更使价格经常处于价值之上。可见，价格同价值不一致，并不是价值规律的否定，也不是违背价值规律，恰恰是价值规律的一般表现形态。我们说，在工农产品价格上，实行的是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只能理解为我们的价格政策应当符合价值规律，并不是工业品和农产品价值真的完全相等。这在过去没有做到，今后也很难完全做到。如果说只要价格和价值不一致，就是违背价值规律，那就天天在违背价值规律了。

当然，价格和价值不一致要有一个限度，不能超出价值规定的界限。就是说，不能过份地高于或者低于价值。过分高于价值不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价格，是生产该产品绝大部分的垄断资本家的，它也不能任意制定，因为定得过高，就会没有销路。过份低了价值也不行。就我国的农产品价格来说，第一，价格不能低于补偿生产资料消耗和补偿劳动者的必要劳动那部分价值。低于此，就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第二，价格不能低到把农业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全部转移到其他部门，那样，农业部门就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了。我们说价格违背了价值规律，主要是指价格过低，影响了一个部门的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就非调整不可。否则，就会受惩罚。一九七九年农产品调价以前，我国农产品价格就是背离价值规律的。据有关部门一九七六年对全国一千二百九十六个生产队的调查，六种主要粮食的生产成本和农业税，每百斤平均为十一元六角，而当时这六种粮食的平均收购价格只有十元零七角五分，亏损百

分之十点六。一九七七年对全国三百零二个生产队的调查，平均每百斤皮棉的生产成本，也高于收购价格百分之二。这样，农业就无法靠本身的积累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才出现了“以副养农”之类的办法。但是搞工业或副业也要有条件，有工业和副业的社队可以“养”，没有的或者只有很少的社队就“养”不成，从而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了。当时，有些社队的生产长期上不去，甚至低于解放初期的水平，原因很多，价格过低，年年亏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算是一种惩罚吧。因此，一九七九年提高农产品价格，势在必行。当然，农产品价格是不是一下子提那么多，可以不可以分两步走，作为经验是可以总结的，但是，农产品价格非提不可，这已经到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地步。

我们常常讲某项政策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或者某项政策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这都不能轻易地下结论。究竟是符合还是违背，必须实事求是，采取科学的态度，认真总结经验。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的教训的。一九五九年，本来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相当严重的一年，但在反右倾的时候，硬说当时国民经济是合乎比例的。而且对于提出比例失调的意见，乱打棍子，说人家攻击三面红旗。结果，不但没有调整比例，而且钢的指标越提越高，使本来就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更加失调了。结果，造成三年经济困难，不得不花更大的力气调整。经济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比例失调达到一定的程度，就非调整不可。同样，也不能把任何一种主观不符合客观的情况，都夸大为违背经济规律。毛泽东同志说过：“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改变的事也是有的。”^①这种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过程，不能笼统地都说成是违背经济规律。

（一九八〇年三月八日，在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第五期研究班报告）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82页。

当前经济情况和经济工作 中的若干问题

房 维 中

同志们！研究班的同志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经济问题和计划规律问题。这个问题我讲不好，特别是计划规律问题，我还没有搞清楚。因此，只能给大家讲一点经济情况和经济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一、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

一九七九年，是我们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第一个战役三年调整的第一年。总的调整情况是比较好的。去年经济情况有四个方面超过了我们原来的设想，其中有三方面比原来预想的要好，有一个方面比原来预想差一点。

第一，工农业增长的速度比原来预想的要好。农业生产，原估计有些地区受灾，棉花要减产，粮食也可能完不成计划。执行结果，粮食产量超过了计划，油料的增长幅度比较大，棉花没有减产，比上年还增加了将近一百万担。农业情况好，是经济情况好的重要表现。

工业生产上半年不太好。整个工业生产上半年才增长4.1%，其中重工业增长6%，轻工业增长1.5%。五、六月间，大家都很着急，这样下去，计划要求工业增长8%、轻工业增长速度超过重工业增长的计划很难完成。下半年，大家抓紧了。据统计局最近的数字，去年整个工业生产增长8.5%，其中重工业增长7.7%，轻工业增长9.6%，全年计划超额完成。去年全国一次能源只增长不到3%，而整个工业增长8.5%，说明降低消耗、提高质量以及企业整顿工作是有成效的。

第二，市场商品供需的平衡，比原来预想的要好。去年初作计划的时候计算，由于要提高工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要扩大就业，要提高一部分职工的工资，购买力增加的幅度很大，商品供应同购买力有不小的差距。为了平衡，当时讨论了几个措施，一是增加生产，二是增加进口，三是动用商品库存。实际执行结果，去年市场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据统计部门计算，去年城乡商品零售总额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以上。这个增长幅度，是近十年来所没有过的。在商品零售额有较大增长的情况下，全国商品库存还有增加，形势也是好的。当然，市场不是没有问题。市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物价上涨，除了国家规定的八种副食品价格上涨和允许一部分小商品上涨以外，有一些商

品去年也涨价了。这是群众反映很强烈的一件事情。另一个是，去年有一部分购买力没有实现，转到今年来了。这两个问题应当引起注意，并且要努力加以解决。

第三，国家外汇平衡，去年年初预计也有不小的差额，要借自由外汇和动用一部分银行外汇存款。实际执行结果，去年外汇的差额，没有那么多，大大缩小下来了。这主要是因为出口收汇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比原定计划增加了。有一点外债，但不是象有一个时期国外舆论那样，什么“中国债台高筑”，“中国到处借钱，将来偿还不起了”。刚刚利用一点外资，怎么就发生偿还不起了的问题了呢？不是那么回事嘛。当然，外国叫一下也有好处，提醒我们借钱要慎重。

第四，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去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价、减免税收、调整工资、发奖金、扩大就业这几件事同时都办了，这几件事一共用了一百几十亿元，比原来计划多用了几十亿元。企业利润增加了，但使用分散了。统计局的数字说，去年工商企业实现的利润比前年增长7.1%，但是上交到国家财政的利润只比前年增长0.4%，相差几十个亿。到底这些钱在那个环节分散了呢？现在还在查。为什么经济形势好，财政会不平衡呢？主要是因为开支加多了，同时有些该收的钱没有收上来，或者收上来被多方面合用了。因此，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也要注意抓财政收入，抓节约财政支出，坚持“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

去年的国民经济，概括讲有这么四个方面的情况，前三个方面比预想的要好，财政平衡方面比预想的要差一点。从去年整个计划执行情况来看，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点，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去年虽然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就业等方面多花了一点钱，但是效果是很好的。现在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很多农民反映，多少年没有给农产品提价，去年给我们长了一次工资。根据统计局的数字，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只有五十二元，1976年只有六十二元多一点，十一年增加十多元钱，平均一年还长不到一元钱。去年，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三年，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大概是八十多元，增加二十元左右，说明农民生活确实有所改善。特别是党中央颁发两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农村政策的落实，农村情况是好的。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农民积极性，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业就大有希望。农业有希望，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就稳定了。加上工业内部调整的见效，说明八字方针是正确的，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点，我们国民经济的潜力是很大的。去年上半年工业增长比较慢，但是，下半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狠抓了经济工作，生产就增长得比较快，说明国民经济是有潜力的。只要政策得当，工作方法对头，把广大干部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的经济可以发展得快一些。

第三点，经济工作要十分谨慎。中国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口多到九亿六千万到九亿七千万，那么多的人口，一个人一年加十块钱，全国算起来就将近一百个亿。所以，我们每一个措施，就每一个人来讲可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全国加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所谓底子薄，就是我们的财力有一定的限度。按照现在的情况，每年国家财政收入只能增加一百亿或者不到一百亿。我们各项经济措施都必须在这百来亿中间打主意，超出了国力的可能，财政就要出问题。去年一年农产品提价

和增加工资奖励两项，恐怕要花一百多亿元，而去年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还不到一百亿元。由于其他许多方面又办了一些好事情，增加了开支，因此尽管把基本建设投资减下了一些，财政还是没有做到平衡。这说明好事要办，但是不能办多了。还是毛主席讲的两句话，人民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

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多年的破坏，经济遭到很大的损失，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粉碎“四人帮”后，应该给人民一些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使生活有所改善，使他们感到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农民生活长期不提高，农民很自然地会对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办集体经济干什么呢，搞了那么多年生活还没有改善。当然，生活提不高，主要是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这个账要记在“四人帮”身上。但是，生活老是没有改善，农民对集体经济就没有兴趣了。改善农民生活，一是靠他自己增加生产，再一个是要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价格不提高，好多地方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伤害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工人长期不提工资，上千万人在城市里得不到就业，影响社会安定，这个问题也非解决不可。因此，中央下决心，在三年调整时期，重点是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把积累比例降下来，使消费比例适当提高。实践证明，效果是好的。因此，不能说我们党和国家不关心人民生活，不能说国家在增加城乡人民消费方面花的力量还小。我们在考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时候，一定要估量到国家有多大的财力，生产有多大的增长可能。如果不考虑这一条，超过了实际可能，那对经济生活实际上会带来很大的问题。而且不能只在消费上打主意，一定要在生产上下功夫。生产上不去，消费的计划也会落空。

二、一九八〇年的经济计划

一九八〇年计划，国务院已经下达到各个地方去了，大家都看到了。大概今年要做这么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把调价、就业、调工资这三件事继续做好。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去年是从四月一日开始的，今年要全年按新的收购价格支付给农民，这个农产品价格“翘尾巴”部分，再加今年要提高棉花等少数农产品收购价格，全年还要比去年多花几十亿元。去年安排了七百万待业人员就业，今年还要继续安排。去年40%职工长工资，从十一月一日开始算起，只有两个月，今年要全年发。这几项算起来，今年要花九十到一百个亿。这是在去年给工人和农民的好处今年照付之外，还要新开支的钱。这个钱不花不行。但是要说明，农产品提价，工资奖励，要坚决按国家规定办事，不能乱来。不然，国家财政就无法平衡。这个事情要坚持做好。

第二件事情，要把生产搞上去，把消耗降下来。首先要争取农业有一个全面的增长。在粮食继续增长的同时，要求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业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农业好了，整个国民经济就活了。再就是努力增加轻工业生产，采取优先安排原料和燃料动力的办法以及其他有效措施，争取轻工业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八以上。为了调整煤矿的采掘关系和油田的采储比例，全国煤炭产量比去年略有减少，原油产量维持去年水平不动。在一次能源没有增加，甚至比去年减少的情况下，要求全年工业生产增长

6%，这个任务还是艰巨的。实现这个任务就要把高消耗降下来，并且努力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这是硬工夫，要花很大的力气。现在我们的能源消耗浪费很大。同日本相比，我们石油、煤炭总消耗量与日本差不多，不比它低多少，但是总产量我们比他们低得多。这么多能源消耗，就生产这么点工业品，应该说很不相称。今年在降低消耗方面要见到更大成效。

第三件事情，基本建设的规模还要进一步压缩。今年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投资比去年减少了一百多亿元，要求我们在加强基本建设管理，安排好基本建设项目，加快建设周期这些方面下工夫，使基本建设的经济效果有一个显著的提高。

第四件事情，就是市场。今年的市场要稳住，市场物价要稳住。群众意见已经那么多了，物价绝不能再有大的波动了。刚刚开过全国物价会议，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安排，但是要认真贯彻执行，还要做很多艰巨的工作。

第五件事情，就是增加出口，扩大外汇收入。

第六件事情，增加收入，节约开支，努力做到财政平衡。

今年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增产节约。无论是提高收购价也好，就业也好，稳定市场也好，增加出口也好，平衡财政也好，关键是看增产节约做得怎样。如果我们生产抓得紧一些，节约工作做得更有成效，今年经济情况就会比去年更好。要看到，今年工作比去年有更好的条件。第一个有利条件是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实际上去年上半年各级党委、各级领导还很难把精力转到生产上，有很多遗留问题要处理，今年这个情况就比较好了。第二个有利条件，我们有去年一年的经验。调整开始我们没有经验，大家的思想认识也并不一致，经过去年一年的实践，有了一些经验，今年工作应当比去年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实现今年的计划，任务是很艰巨的，要求我们兢兢业业地去做工作，不能掉以轻心。

关于调整工作，去年搞一年，今年搞一年，明年还要搞一年。坚持搞三年，国民经济一定会见到很大的效果。有几条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第一，人民的生活可以得到一定的确实实的改善，积极性会更大的调动起来。

第二，农业这个基础会得到加强。

第三，工业企业的管理会走上轨道，内部的比例关系会趋于协调。

第四，这几件事办好以后，国家财政肯定会增加起来，国家增加的财政收入可以逐步多用一些基本建设，来搞科研和教育事业。

第五，农业生产增长以后，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和轻工原料可以逐步减少，首先可以把棉花、油料、糖这部分进口减下来，用这部分钱从国外引进新技术，加快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

因此，对于调整我们是有信心的。按照已定的规划做下去，做三年，一定会见到效果。

最近，国外一些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时，说中国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九亿多人口，他们很难想象九亿多人口的国家，计划是怎么做的。日本只有一亿多人口，美国两亿多人口，就是把九亿人口搬到美国，他也吃不消，受不了。所以讲到经济工作，评价我们经济工作做得好不好，工作有没有成效，恐怕有几个情况应该联系到。一个是林彪，“四

入帮”十年破坏，经济工作遭到极大的损失。问题成堆，到处欠账，不是短时期能够解决得了的。我们要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但过急了不行。二是我国有九亿多人口，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通盘考虑，慎重从事。不考虑国内情况，简单地同国外比，说人家的生活怎么样，人家占多大比例，都不一定恰当。三是经济很复杂，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互相联系。看问题不能仅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看，要从全局来看问题。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看是应当做的事情，从全局来看就不一定应当做，做了不一定有利。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要考虑上述这些情况。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有些问题就不容易说清楚。我们要努力工作，争取把经济搞得快一点，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现有的基础，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提出了而做不到，反而会影响和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三、经济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对于整个经济工作，全国人民都很关心，国外也很关心。除了政治上能不能安定团结之外，大家担心的是经济工作能不能搞好，既怕慢，又怕乱，怕折腾。最好搞快一点，慢了不解渴，但又怕折腾，怕不稳当，怕走弯路，走了弯路再来收拾，反而更慢了。目前理论界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都在探讨，怎么搞得快一些，而且不出大的问题。现在各方面都在进行改革，我想就这个问题讲几点意见。

1、我们的经济要搞活，不要搞死，改革是必要的。长期以来，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是过死，缺乏活力。在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必要的，但急于向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个时期甚至连集体所有制经济都要向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带来很多问题。什么都想包下来，包死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商业上，原来很多城市有夫妻店，半夜十二点也能买到东西，改造的结果把这些都取消了，国营商店九点钟开门，七点钟关门，过了这个点想买东西也无处可买，对人民生活很不方便。这并不是说全民所有制不好，在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下，急于向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实行单一的经济成分，这个事情恐怕不行。再一个就是急于搞产品交换。既然都是全民所有制，就要搞产品交换，取消生产资料的商品化，结果也把经济搞死了。不搞商品交换，什么都由国家调拨，企业之间没有竞争，造成企业不关心产品的命运，反正不直接和用户见面，生产出来的东西都直接交给物资部门或商业部门，好不好，有无竞争性，我都不管。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它的活力，就是靠竞争，企业极其关心产品的命运。产品是否合乎市场需要，能否销售出去，决定它能否获得利润。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但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竞争又造成了生产的盲目性。我们是公有制，应当而且可以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利用商品交换，利用竞争，促进社会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再一个是，基本建设上搞实报实销，财政上搞统收统支，用多少钱向国家要，最后花多少钱都向国家报销，企业不负经济责任，因此企业不注意缩短建设周期，不注意投资效果，不注意增收节支，这样做也把事情搞死了。再就是生产好坏同个人的经济利益不挂钩，企业没有主动权，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计划管得太多太死，行政层次太多，中间环节太多，关卡林立，把经济管死了。长期以来我们闭关自守，只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打圈子，这也搞死了。本来世界那么大，有那么多国家，为什么要

把大门关起来，不同外国发展经济技术交流呢？这些都需要改。改革的大方向一定要肯定。不然就只好一潭死水。改革是大势所趋，顺乎潮流。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不能墨守成规，不能说我们原来的那一套都是好的。三中全会指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不但在政治上是十分重要的，在经济工作中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现在看，解放思想还要作很多工作。

2、要避免折腾，避免走弯路。我们过去发生过的大的曲折，除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坏人捣乱之外，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在形势好的情况下，在思想比较解放的时候，容易头脑发热，对问题处理不当，也就容易发生折腾。形势一好就想大干，高指标一来，就折腾。解放思想，海阔天空，脑子一热，行动不慎重，就发生折腾。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大折腾就是如此。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结果把规章制度都烧掉了，甚至把技术资料都烧掉了，把必要的成熟的经验都破坏了，什么都要大办，都要化，造成了大的折腾。所以越是在形势好的时候，越是提倡解放思想的时候，越要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解放思想的同时，提出要实事求是，这是很重要的。解放思想，要破除一些东西，要打破常规，但不是什么都不顾了，什么都不要了。有些准则，有些规律，有些基本原则，是不能违反的。现在咱们的国家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绝不能再折腾了。经过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经济困难很多。无论如何要搞得稳当一点。先念同志最近讲：“中央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争取国民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一定要保证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去争取实实在在的速度，持续发展的速度。这条指导原则各方面都要认真贯彻执行。”我们应当努力遵照中央的要求去做。

3、思想上要解放，行动上要慎重。思想上不解放就改革不了。想都不敢去想，那怎么改呢？但又要避免折腾，因而行动上一定要慎重。大的改革，一定要经过试点，要先立后破。很多改革，我们吃了亏，就是因为没有经过试点，取得完整经验就推开了。回想一下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没有搞试点，一个公社挂起了牌子，全国一号召，就都挂起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没有一套具体章程，什么叫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怎么搞法，都还闹不清，反正挂起牌子再说。结果搞起了人民公社，体制一变再变，最后还是落到队为基础。还有些工作，只搞了几天试点，试了几个月，情况并没有搞清楚，就推广开了。一切经过试验，取得经验，然后再推广，这是毛主席多次倡导的，但回想一下，我们有许多事情由于没有这样做，因而走了弯路。现在我们搞扩大企业自主权，搞市场调节，搞扩大地方权力，这是必要的，但鉴于过去的经验，也必须进行试点，取得完整的经验，订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才能推开。对于整个体制改革，更应该如此。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多个企业，应当更加慎重。搞得不好，发生了问题，再来纠正，时间耽误了，而且会造成大家对改革信心不足，结果不利于改革。我们有些事情，往往是不动就多少年不动，一动就想马上推开，急于求成。今年经委派人到匈牙利作过些调查，匈牙利搞体制改革，它是准备了几年的时间。这个国家才一千多万人口，大概和我们一个烟台地区的人口差不多，企业也不多，但还是准备了几年，并不马上实行，经过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然后训练干部，然后再在全国推开。现在我们搞体制改革，不能急急忙忙地动手，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方案，不预计到改革会出现的问题，先改起来再说，就非出纰漏不可。我们有许多事情还是“先破后立”，干起来再说，这种办法至